

共地下党力量的帮助下、历经艰险抵达了重庆即相对安全的后方。1942年，在重庆的巴金结识了周恩来；并得知周公要早他十年就已经在法国勤工俭学了。周恩来的身边集聚和团结了一大批身处国统区的文化精英，而和周恩来接触到1944年末的巴金、基本上认定了中国共产党是民族未来航行舵手的基本观点。巴金，还去机场参与欢迎前来重庆参加停战谈判的毛泽东主席，并和毛声称放弃无政府主义。

抗战胜利之后，巴金回到上海居住、创作；目前其在武康路的故居已经成为旅行者们可以参观的文学圣地。上海解放前夕，目睹没落腐朽的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，巴金坚决地抵御了一切拉拢、无惧人身威胁而拒绝前往台湾。这一回又是周恩来直接命令潘汉年系统——全力保护宋庆龄、巴金等民主人士的绝对安全！

巴金和宋庆龄，几乎就是隔着一条马路（如今的淮海中路）的邻居。那天黎明，他俩都亲眼目睹了细雨蒙蒙中睡在街道上的人民解放军队伍。也就是从那一刻，他俩都坚定了对一个即将新生的人民政权的高度信任。他俩也都受到了周恩来的亲自动员，先后参加了人民政协的奠基礼。巴金积极响应，1949年7月2日，巴金参加了在北平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，这次会议被周恩来称之为解放区文艺大军和国统

区第二条战线文艺大军的大会师。同月23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，巴金当选为该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巴金作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代表，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。10月1日，他应周恩来的邀请在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。

此后，巴金的心情相当愉快。1950年，他出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、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，开始了对苏联文学代表作品的出版和推介工作。这些出版物，也成为国家外交事物活动（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）中的国家礼物。而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，更是激发了巴金炙热的爱国情怀。如1950年11月，巴金受周恩来委派参加了华沙第二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，同年12月24日，他又出席了北京各界声援中朝人民抗美援朝大会。

巴金在抗美援朝前线

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巴金，已经和同事们一起反复学习了毛泽东主席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这让周恩来总理感到很欣慰。巴金自觉地品味当时苏联文学大师如高尔基的作

巴金纪念馆。

